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曾永義 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十一編 第27冊

明前期臺閣體研究

何坤翁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

曾永義主編

第27冊

明前期臺閣體研究

何坤翁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明前期臺閣體研究／何坤翁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2+19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第 27 冊）

ISBN 978-986-404-135-0（精裝）

1. 明代文學 2. 文學評論

820.8 103027561

ISBN-978-986-404-135-0

9 789864 041350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十一編 第二七冊 ISBN：978-986-404-135-0

明前期臺閣體研究

作　者 何坤翁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十一編 29 冊（精裝）台幣 5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明前期臺閣體研究

何坤翁　著

作者簡介

何坤翁，湖北來鳳人，土家族，1969 年生。現爲《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版編輯，專職負責文學欄目。

童年在來鳳鄉間生活，12 歲那年，來到武漢大學校園生活。由鄉間來城市，留了一級，先在武漢大學的附屬小學讀書。後來上附屬中學，再就是中學畢業，念了大專，學的是經濟學。

大專畢業後，做電腦程序設計。工作 6 年後，考入武漢大學念文學碩士學位，畢業後留校，成爲《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版的編輯，在職獲文學博士學位。

提　要

在明代文學發展歷程中，臺閣體歷來是被批評的對象。《明前期臺閣體研究》在考察明代前期政治文化生態的基礎上，切入明代前期文學發展的具體情境，對明代前期臺閣體予以重新認識。

在以往諸家明代臺閣體研究基礎上，清理史料，會綜觀點，講述不追求賅備，而以補闕爲目的，有五點心得：

1、糾正文學史上長期流行的「三楊」說。指出臺閣體的代表是「二楊」，即楊士奇與楊榮，楊溥不是代表作家。楊榮先主文柄，楊士奇後主文柄。

2、從史部角度審視臺閣體作家的面目。長期以來，人們對臺閣體的關注停留在集部，對臺閣作家的文學行爲作了人爲的放大。本文指出，臺閣作家首先是政治家，文學是其餘事，這決定了他們的文學是收斂的。

3、臺閣體文學一直被認爲是館閣制度的產物。本文糾正這一看法，指出永樂皇帝的文化壟斷政策，是臺閣體文學誕生的秘密。

4、「雍容平易」是臺閣體文學的總特徵。諸家研究對什麼是雍容平易，語焉不詳。本文追溯雍容平易的歷史來源，揭示出雍容平易的含義。

5、臺閣體爲什麼消歇？從清人以來，一直認爲是臺閣體末流形式徒具，簡單模仿所致。本文糾正這一看法。指出文化解釋權由朝廷走向山林，朝廷的文化壟斷無法繼續，山林詩浸入臺閣，於是，臺閣體倒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次

引　言 …… 1
第一章　洪武政治文化生態與臺閣體的初生 …… 5
　一、儒家敘事傳統的恢復 …… 5
　二、《洪武大誥》及《皇明祖訓》的威權框架 …… 13
　三、臺閣體的初始樣本《榮進集》 …… 20
第二章　方孝孺之死與臺閣體的形成 …… 31
　一、作爲洪武政治理想傳遞者的方孝孺 …… 31
　二、作爲洪武文化精神繼承人的方孝孺 …… 36
　三、方孝孺的文學觀念不合臺閣體式 …… 50
　四、方孝孺之死與士人精神的喪失 …… 58
　五、小　結 …… 66
第三章　臺閣體文論 …… 69
　一、永樂皇帝的文化壟斷 …… 69
　二、臺閣作家的政治品格 …… 79
　三、「雍容平易」溯源 …… 97
第四章　臺閣體詩論 …… 109
　一、臺閣體詩人群體的形成 …… 109
　二、臺閣體詩的內容 …… 119
　三、臺閣體詩的風格 …… 129
　四、臺閣體詩派的消歇 …… 134
第五章　「三楊」考論 …… 153
　一、楊榮首主文柄 …… 153
　二、楊士奇後來居上 …… 164
　三、楊溥不是臺閣體代表作家 …… 175
結束語 …… 185
主要參考文獻 …… 189

引　言

發生於明前期的臺閣體，是理解整個明代詩文的阿基米德點。

相比於前代，明代詩文的整體成就不高。宋濂、劉基、高啓三人，被視爲明代文學的巨擘。但是，三人的主要創作業績都在元代，嚴格說來，他們是元代的詩文作家。明代作家多以詩文觀念的紛爭留名後世，而非創作的實績。

明代詩文作家拋給後人的是一大堆觀念，連他們自己都沒有理弄清楚，或者就是不屑於理清。今天的文學史家在處理明代文學時，注意力首先被雜多無序的明代文論所吸引，不得不花費很大的氣力，試圖從前後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流派中，找出明代詩文現象的根據。然而，很多人忽略了臺閣體。

沒有對臺閣體的正確理解，明代詩文的爭鳴現象是無法索解的。傳統文人的終身追求，道德功業之外，就是立言不朽。道德功業可遇不可求，而立言在己是可求的。臺閣體曾經是文人達到不朽的立言模式。它曾經那樣成功地將大量作者引到不朽的行列，而且不怎麼費力地就達到了目的。這種模式到李東陽的時候，忽然效力打了折扣，於是，李東陽倍感焦慮。他著手對臺閣體模式進行修補，要讓它繼續發揮立人於不朽的作用，起碼讓李東陽自己不朽。後來的李夢陽、王世貞等人，瞄準的首先是臺閣體模式，因爲只有這種模式曾經是本朝歷史上證明有效的。臺閣體模式成爲每一個追求不朽者的參照文體，無論取法秦漢還是傾心唐宋，都是比照臺閣體模式的一種選擇。之所以這樣，有一點是確定不疑的，那就是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唐順之之流，眞正在乎的不是文學會怎樣流變，而是怎樣以文學爲手段，達至個

人的不朽。他們雖然不乏挽救文學流弊的眞誠，但更富爭論的激情。聯合同志，挑戰權威名流，造成一種熱鬧的文學風氣，以江湖撼動朝廷，進入歷史檔案，才是他們文學論爭的根本目的。這其實是臺閣體情結在新環境下的一種表現。湯顯祖給友人的信中說，「間求文字者，多村翁寒儒小墓銘、時文序耳。常自恨不得館閣典制著記，餘皆小言語，因自頹廢。」「不得與於館閣大記，常欲作子書自見。」又說：「僕極知俗情之文必朽，而時官時人，輒干之不置，有無可如何者。偶而爲之，實未嘗數受朽人之請爲朽文也。然思之，亦無復能不朽者。」這是私人信件，眞心眞語。湯氏所表達的正是臺閣體情結。〔註1〕

爲了理解明代的詩文現象，必須從臺閣體入手。

臺閣體的傳統研究方式，一直以集部爲中心，就臺閣體作品取材，構建觀念。對於別種類型的作家，這是一種可靠的方式。對於臺閣體作家，則宜當別論。有分量的臺閣體作家，幾乎全是政治家。在集部範圍的書寫中，他們不能自由，講述有故意失眞的地方。所以，以集部爲中心得到的關於臺閣體的結論，可信度值得懷疑。研究者也許有足夠的警覺，不受臺閣作家的謊言干擾，但是，集部中心的思考方式，限制了研究者所能達到的深度。從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幾位著名學者對臺閣體的考察，底極是回溯到翰林院制度，認爲臺閣體的流行，與館閣制度關係最爲密切。然而，這是經不起推敲的。宋代有翰林學士院，蘇軾就做過翰林學士，而臺閣體沒有在宋代流行。元代有翰林國史院，文學家虞集拜翰林直學士，臺閣體也沒有在元代流行。單就明朝來說，胡廣、楊榮之前沒有臺閣體，楊士奇亡後，臺閣體很快消歇，李東陽也無力挽救臺閣體的頹局，這些現象是在幾乎同樣的館閣制度下發生的。不僅如此。考察重心落在集部時，臺閣體作家的文學行爲被不經意地過度放大，他們成了專業的寫作者，似乎與李夢陽、王世貞一樣，爲了詩文之工而嘔心瀝血。

如果我們將視線轉向史部，就會發現，臺閣體作家在那裡別是一番情景。他們的身上承載著歷史，想要隱身或者說謊，反而比別的作家都困難。臺閣體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文學體裁，要準確地理解它，必須先瞭解它背後的政治。可靠的辦法是從臺閣作家入手，不是從臺閣作品開始。臺閣體作家不以

〔註1〕參看程芸《「道學」與湯顯祖的文體選擇》，載《武漢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文學爲事業，而是爲政之暇，肆其餘力，發爲文章。他們身分崇高，都藏身在史部。我們可以史部爲經，集部爲緯，通過經緯交錯，讓臺閣體的眞面目浮出水面。本書就是以史爲據，詳考臺閣作家的政治生活，參以他們的作品，揭示明前期的臺閣體文學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爲什麼是那樣一種面貌。文學本位的追求目標，構成本文的敘述邊界，儘管大量採用《明史》《明實錄》等歷史典籍，而指向始終不離文學，力圖防止溢出文學界限，浸入到明代史學中去。

臺閣體的當代研究成果，是本文寫作的出發點。有幾部著作，值得分外關注。熊禮彙教授的《明清散文流派論》、陳文新教授的《中國文學流派意識的發生和發展》及《明代詩學》、黃卓越教授的《明永樂至嘉靖初詩文觀研究》、陳書錄教授《明代詩文的演變》，還有早期廖可斌先生的《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觀點各有勝場，代表了當代研究臺閣體的高水平。又有籍芳麗的《明代文壇「三楊」研究》，是一篇碩士學位論文，水平不低，值得重視。鄭禮炬的博士學位論文《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間的翰林院與文學》，對明代的翰林文學與臺閣體作了相當詳細的個案研究，功底紮實。臺閣體的現象描述、內容風格、盛衰轉換，在諸家的著作裏，已經揭示無遺；臺閣體作家的生平經歷、性情喜好，也挖掘殆盡。置身諸賢大作之後，作臺閣體的研究，本文意在補闕。

臺閣體研究中，有兩個問題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一是偶然性。臺閣體文學是偶然因其人因其事而成，那麼，研究的重點就是追溯什麼人什麼事，造成了臺閣體。目前的研究狀況卻是，人們對規律性的偏好，動輒將臺閣體引到文學邏輯的發展軌道上，讓它成爲一種文學轉換的必然。二是「三楊」術語。「三楊」幾乎成爲臺閣體的專有名詞，文學史以此設立論述框架，研究專著以此作爲思考的中心點。這個詞語影響非常大，生成了臺閣體研究的盲點。其實，文學現象的「三楊」在歷史上根本不存在，歷史上存在的是政治「三楊」。本文重點在回答上兩個問題，講述中不求完備，但求解決問題，凡是諸家論述已美已備者，惟心存敬仰，行文中儘量不重複。

明前期臺閣體的時間段，諸家著作有相當一致的說法，這裡再明確一下：本文所論明前期臺閣體，從解縉之死起算，至景泰元年之前。這與諸家說法並無不同，只是細緻一點。解縉永樂九年入了詔獄，在牢中呆到永樂十三年才死。只要他不死，文學的名望仍在，臺閣體就無法出頭。

本文不是明前期臺閣體的賅備講述，而是幾個問題探討。欲求得賅備論述，盡有前賢著作可供閱讀。

第一章　洪武政治文化生態與臺閣體的初生

明代的臺閣體以楊榮、楊士奇爲代表作家，主要活動在永樂後期至正統初。純粹以文學方式來講述臺閣體，應當直接從永樂後期開始，也可以斬斷一些無謂的文學糾葛。但是，明代初期的兩件重大政治事件，建文新政的失敗與重修太祖實錄，促使我們從洪武時期來追述臺閣體的政治起源，因爲臺閣體文學首先是政治的，其次是文學的。建文新政與永樂統治，是以對洪武制度的態度差異相區別的，永樂帝對洪武理念形式化的執守，造就了臺閣體。臺閣體的種子，由洪武帝親自埋下。

一、儒家敘事傳統的恢復

朱元璋信奉儒家道德，是程朱理學的推行者。他與宋濂、劉基的君臣和諧關係，也有儒家倫理作基礎。早年在軍旅中，宋濂便恒侍左右，爲朱元璋講授理學，包括《春秋左氏傳》和《尚書》。對宋濂宣說的儒家教義，朱元璋「悉稱善」。《明史》劉基傳說：「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己以聽，常呼爲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註1〕

天下一統後，身爲皇帝的朱元璋在全國推行儒家教義。洪武二年十月，詔令天下府州縣都設立學校。他諭中書省臣說：「學校之設，名存實亡，兵革以來，人習戰鬥。朕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

〔註1〕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782頁。本文所引《明史》均據此本，後引僅標卷次、頁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雖有大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註2〕這是一種學制上的創舉。徐一夔《德慶府端溪縣新建廟學記》說：「皇朝既一四海，乃洪武二年冬，制詔州縣興學。且監前代虛文之弊，嚴立教條，限以歲月，務底成效。於是天下風動，凡有民社之責者，莫不知興學，而人亦莫不知務學矣。」〔註3〕趙翼《陔餘叢考》卷二八《秀才》條說：「府縣學生員之制，始於明太祖。欲令人才一出於學校，於是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副以訓導。其生員之數，府四十，州、縣遞減其十；月廩人六斗。其後命增廣員數不拘額。」〔註4〕

洪武帝鑒於元人不重儒術，禮崩樂壞，享國不足百年，他要將江山傳之萬代，就不能不大興教化，推廣程朱理學。儒家主張仁政，認爲只有寬厚仁愛的治理才能保證社會穩定，漢代賈誼總結秦朝速亡的教訓，就曾提出「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眞的是這樣嗎？務實的洪武帝一方面堅信儒家學說，一方面又認爲只有猛政才能鎭伏頑囂，他向已經致仕鄉居的劉基提出了疑問。《誠意伯文集》卷二〇《皇帝手書》云：「皇帝手書，付誠意伯劉基。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於京師。我之疆宇，比之中國前王所統之地不少也。奈何元代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然歹人惡嚴法，喜寬容，謗罵國家，扇惑是非，莫能治。即今天象迭見，且天鳴已及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日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山中或有深知曆數者，知休咎者，與之共論，封來。前者，舍人捧表至京，忙，忘問卿安否。今差克期往卿住所，爲天象事。卿年高，家處萬峰之中，必有眞樂。使者往而回，勿齎以物，菜飯發還。洪武四年八月十三日。」〔註5〕黃伯生《故誠意伯劉公行狀》說：「八月，帝使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註6〕劉基的意見，沒有改變皇帝施行猛政的決定，但對帝國的文教會有勸進作用。

洪武五年，皇帝又令宋濂爲師，教授全國的少年英俊。《明史》宋濂傳說：「是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

〔註2〕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204頁。
〔註3〕徐一夔：《始豐稿》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4〕趙翼：《陔餘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
〔註5〕劉基：《誠意伯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6〕劉基：《誠意伯文集》附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註7〕

對於皇太子朱標，更是嚴格按照儒家的一套教義，培育他的德行學問，盼望他能成爲符合儒家理想的君王。朱元璋還在作吳王時，就注意讓兒子「察民情好惡以知風俗美惡」，有一年冬天，吳王朱元璋參拜郊壇，令左右帶朱標到農民家裏參觀，熟悉農民的生活狀況。朱元璋又指著路旁的荊棘，對朱標說：「古用此爲撲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洪武元年，朱標被立爲太子。國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被選取來陪侍太子讀書。朱元章對殿中侍御史郭淵友等說：「諸生於文藝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不流浮靡，庶儲德亦獲裨助。」宋濂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儒，一直負責太子的教育。「濂傅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云。」

洪武六年四月，皇帝對他一向親信的劉基起了懷疑。《故誠意伯劉公行狀》說：「初公言於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巡檢司守之。』帝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其事，徑詣帝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詆老吏訐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帝聽。遂爲成案，以奏。」〔註8〕《明史》劉基傳稱：「帝雖不罪基，然頗爲所動，遂奪基祿。」〔註9〕這類事情無疑會加深皇帝對帝國前途的憂慮，影響他採信儒家的具體方式。

理學作爲官方意識，是由朱元璋的明王朝開始的。但知識分子對理學的尊崇，在元代中葉已經發生，一直持續到元末，卻得不到元朝廷的積極回應。蒙古貴族在思想意識領域的統治相當鬆散，儘管科舉取士分榜錄取，並且對漢族人擔任政府官員作了諸多限制，但是這種歧視是表面的。如果考慮到蒙古人的數量極少，而漢人數量巨大，蒙古人在漢人中彷彿泡沫在大海上，隨時會被吞沒，那麼，元朝廷實行的分榜取士及種種限制漢人的做法，就是不

〔註7〕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八，第3785頁。
〔註8〕劉基：《誠意伯文集》附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9〕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二八，第3781頁。

得已的。任由數量占絕對優勢的漢人與蒙古人在科場和官場上自由競爭，不需要戰爭，在短時間內漢人就可以將蒙古貴族的政權接過手。蒙古人與色目人結爲同盟，反映了在與漢族人口對比懸殊下的憂慮。當初，蒙古鐵騎每佔領中原一個地方，就要屠城，也一定是出於人口對比的考慮。即使元朝廷已經建立，相對於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數量來說，漢人實在太多了，每一個蒙古人和色目人都被包圍在漢人的海洋裏。進入元廷的知識分子如劉因、許衡、吳澄等，以孔孟之學起家，實則奉守的是朱子理學。他們倡導的理學，在讀書界中影響廣泛，而不能獲得朝廷的制度支持，理學中的華夷之辨是最大的障礙。元朝廷對理學缺乏熱情，卻放任理學的自由傳播，正是蒙古統治的寬大，在思想意識領域毫不設防。朱元璋上臺恢復了漢人執政，元朝廷面對的人口威脅政治的處境蕩然無存，元朝知識分子一直倡導的理學成爲明王朝的官方意志，可謂水到渠成。

由於中國文化的狹隘封閉，讀書人如果捨棄釋道兩途外，便只有習儒，別無其它可以安頓生命。釋道崖岸高絕，不能成爲生命力展放的常態。儒家學說作爲主要的生命力吸納機制，卻被元朝廷等閒視之，使得大量的讀書人將身心託付給儒家學說後，無法入仕，只能轉而寄情山水，以儒家的心態步履釋道的途轍。元代知識分子的這種遭遇，使他們的寫作疏離了政治，最具有今天所說的文學意味，卻偏離了儒家傳統的敘事方式，按照儒家學者的看法，元代恰恰是一個不夠文學的時代。關漢卿、楊顯之、王實甫等劇作家的活躍，都證實了儒家敘述方式的衰微。到了元末，楊維楨馳騁才氣，奇奇怪怪，吐納珠玉，專以詩文爲藝，與存史載道之文異趣，影響遍於吳越。此時，元朝廷苟延殘喘，朱元璋的政治勢力顯示了漢人即將復政的曙光，嘉定文人王彝針對楊氏文風，撰寫了《文妖》，云：「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余觀楊之文，以淫辭怪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而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則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會稽楊維楨之文，狐也，文妖也。」〔註 10〕四庫館臣評楊維楨《東維子集》云：「朱國楨《湧幢小品》載，王彝嘗詆維楨爲文妖。今觀所傳諸集，詩歌、樂府出入於盧仝、李賀之間，奇奇怪怪，溢爲牛鬼蛇神者，誠所不免。至其文，則文從字順，無所謂剪紅刻翠以爲塗飾，聲牙棘口以爲古奧者也。觀其於句讀疑似之處，必旁注一句字，使讀者無所岐誤，此豈故

〔註 10〕王彝：《王常宗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爲險僻欲使人讀不可解者哉？」〔註 11〕館臣理解有誤。王彝指斥楊氏者，不是其文章形式而是內容。《湧幢小品》卷一六《文淫妖》條云：「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爲文本經術。會稽楊維楨，以文主盟四海，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於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註 12〕朱國禎所記，明明王彝是從內容上批評楊維楨的。王彝批評楊氏，正是當時文壇風氣開始轉變的信號，要從詩酒留連的藝文轉爲儒生入世的道德之文了。這種變化，當然是朱元璋政治集團給儒生帶來希望而引起的。

明王朝的建立，讓讀書人獲得了精神解放。元朝廷並不曾壓制自由的思想，只因爲沿襲既久的儒家制度禮儀，突然間遭遇冷落，讀書人視之爲布帛菽粟不可須臾離的儒家文明，在政府的眼中竟然值不得什麼，儒生的精神失落了，他們感到了空前的壓抑。當洪武帝重新拾起孔孟之道，將理學確定爲國家意志時，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都歸心於新政府了。

元朝的統治不足百年，蒙古人口數量很少，在生活風俗上對漢人的影響不大。總體來說，當時的民間習俗，基本是各行其是。朱元璋被讀書人視爲扭轉元胡風氣的帝王，主要不是生活方面的移風易俗，而是恢復儒家學說的政治統治地位。新朝指責元朝的罪行，主要是蔑視孔孟之教，而洪武帝的莫大功勞就在於撥亂反正。對此，《明太祖高皇帝實錄》有多次記載。卷四六「洪武二年冬十月辛卯」云：

> 命郡縣立學校。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膻，污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以兵亂以來，人習鬥爭，鮮知禮義。今朕一統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註 13〕

卷七九「洪武六年二月壬午」：

> 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爲優戲，違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爲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甚爲瀆慢。故命禁之。

卷一五三「洪武十六年三月庚戌」：

〔註 1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八，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年版，第 1462 頁。

〔註 12〕朱國禎：《湧幢小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註 13〕《明太祖實錄》，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後引《明實錄》均據此本，不另出注。

> 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陛下而已。陛下祖宗積德累善，至於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雜伯道而不純。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爲制命，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

在朱元璋手上確立的明代科舉，以制度方式保證了讀書人的政治出路，樹立了朝廷留心聖學的形象。由元入明的淩雲翰，對此深有感觸，其《送金元哲之官分水序》云：「聖朝之設科也，本德行而兼六藝，黜詞賦而崇禮樂，蓋有合於成周三物教民賓興之意。若明經對策，則又斟酌漢唐之制而加詳焉。是欲底於實效，非徒事乎虛文而已。一時之士，咸喻上意，莫不鼓舞奔走以報。」〔註 14〕洪武年代所立的科舉，效果在永樂時就看得更清楚了。永樂年間的梁潛，在《溧陽縣學鄉貢題名記》中說：「進士之科，自隋唐距今幾千年，賢豪俊義之出不可勝計。聖明統一萬方，詔天下立學，既歲貢其士子之賢者，又取之以進士之科，此與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並行不廢也。故今之得士也尤盛，至於薰陶消化使人人自趨於善，禁制防範使不失其性，則三代以下未嘗有也。由是海隅邊徼萬里之外，皆翕然響應。」〔註 15〕科舉選士在宋代已經臻於極至，明朝的科舉與宋代相比，格局太狹，束縛人性。在洪武朝開科不久即停科，到洪武十八年科舉才成爲定例。儘管如此，明王朝繼元朝罷科舉、輕視科舉之後，恢復取士以科目爲重的傳統，贏得了讀書人的普遍讚頌。清人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〇《元史》部分，評論玉山草堂、清閟閣等文人集會，「獨怪有元之世，文學甚輕，當時有九儒十丐之謠，科舉亦屢興屢廢，宜乎風雅之事，棄如弁髦。乃搢紳之徒，風流相尚如此。蓋自南宋遺民故老相與唱歎於荒江寂寞之濱，流風餘韻久而弗替，遂成風會，固不繫乎朝廷令甲之輕重也歟！」〔註 16〕趙翼不知元人詩酒集會，多偏於藝的方面，遠離儒家風人之旨，正是科舉屢廢所致。明王朝重視科舉，文學必然回歸到儒家的傳統，

〔註 14〕淩雲翰：《柘軒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 15〕梁潛：《泊庵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 16〕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〇《元季風雅相尚》，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版，第 705 頁。

以政治文學爲主腦。

儒家的書寫傳統是由《詩》《書》《春秋》等確立的，在美刺和實錄之先，必須嚴華夷之辨。洪武政權占盡了華夷之辨的好處，朱元璋僅憑文明再造的身分，就足夠在儒家史書系統中獲得大寫的形象。他對儒家書法又相當留意。黃佐《翰林記》卷一《史館》云：「聖祖初建吳國，重史事，設起居注。甲辰年十月，以宋濂爲之，日侍左右，紀言動。繼濂者王禕、樂韶鳳。即大位後，吳琳、魏觀、劉季道由明經任，郭傳由翰林應奉任，范常由直學士任，蔣學、閻鈍、蔣子傑由舉人任，熊鼎由考功博士任，陳敬由編修任。未幾革之。洪武十四年九月己丑，詔復置起居注，秩從七品，以儒士單仲祐任焉。二十四年，詹同猶爲起居注，其後竟廢。令本院史官專之。每朝則立班紀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爲《日曆》，書言以爲《寶訓》。永樂中，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註 17〕洪武二年，詔修《元史》，以通判王禕總裁其事。王禕請朋友徐一夔參加，一夔作《與王待制書》，拒絕入史局。書云：「而僕自有知，頗識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且聞史事尤甚疏略，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註 18〕對比元朝諸帝對史實的態度，洪武帝充分儒家化了。

儒家教義的原始存在靠四書五經，現實存在則必須依託當下的政治。古代書的四部劃分依據的是儒家標準，史部可以視爲儒家的緯線。對於信奉儒家學說的讀書人，子部和集部遠沒有史部重要。洪武帝有清醒的歷史表演自覺，平時有意製造意義深刻的君臣對答，或者評價歷史興亡，或者發表對儒家經典的獨特見解。這些作爲記言部分，讓他的形象變得光輝。

對於儒家主張的美刺，朱元璋只接受讚美，反對譏刺。他可以聽納不同意見，甚至是逆耳的言論，但進言者必須站在美化朝廷的立場上。逆耳之言要有補於朝廷聖德，而不是冷眼旁觀式的批評。明人葉盛《水東日記》卷四，記錢宰致仕，云：「臨安錢宰子予，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廟禮徵，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冬冬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

〔註 17〕黃佐：《翰林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註 18〕徐一夔：《始豐稿》卷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